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五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十年寒窗

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近四十五年期间，碰到过许多美好机遇，这些机遇在社会大环境变动的不同时期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果。我在北大的“前半生”，即1956年至1976年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反复折腾的十年寒窗生活和十年文革动乱，许多美好的机遇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往往成了遭遇，陷于屡遇屡失的命运。我在北大的“后半生”，即1977年至2001年改革开放后二十五年期间，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系列弥足珍贵的迟来机遇，演绎了我“后半生”晚成的教书生涯。

2018年北京大学建立120周年之际，我曾在专设的北大在线校庆留言栏上表达对母校深切感恩之情：“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有幸曾是北大经济系（学院）唯一的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当年作为年轻的归侨学子都有一个青春梦想，就是‘北上归国深造，参加祖国建设’，而北大是我实践这个梦想的坚实平台，铸就了我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祖国共呼吸同命运的人生轨迹。”

1956年我在“向科学进军”的感召下，心中抱着将来争当一个“苏式副博士”的理想，

考入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大学学习生活。不料在良师教导下埋头读书的情境持续不到一年，1957年春夏之交全国就掀起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北京大学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我生平第一次突然面对这样猛烈的政治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对反右派运动很不理解，在当时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我对当时校内校外处理所谓右派言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他们在鸣放期间的言行，并没有按照原定的“助党整风”的精神区别对待和具体分析，而是一概断定为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乃至反革命性质和反动主观动机。我认为这有先入为主，主观失实之嫌，进而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辩论和批判会缺乏以理服人的精神，没有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方针，有以势压人，一棍子打死之虞。

我对反右派运动抱有的抵触情绪和保留态度直至反右派斗争后期未能得到克服，陷入了思想矛盾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此时我想到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小说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叫丹柯的青年身陷大灾难中，手里拿着自己那颗燃烧的心，寻找走出黑暗森林的求生之

路。后来通过阅读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苦难的历程》和被列宁誉为“艺术巨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也收到相关的深刻启示和影响。前者描述四个性格不同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的个人幻想开始破灭，在动荡的年代里各自有着曲折复杂的探索 and 追求。他们经历“苦难历程”，经受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终于跳出个人感情和愿望的狭隘圈子，在同国家和人民的结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真正的幸福。《苦难的历程》也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回家，到祖国之路”。另一部被列宁称为“真正的文学”的文学名著《怎么办？》正如其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所提示的，小说中忠实描绘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群知识分子“新人”同旧世界决裂和不懈斗争，创造新社会生活的故事，是一部“能够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的“生活教科书”。

在反右派斗争中“陷入思想苦闷”之时，



2015年正中学校建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向母校献礼（北大纪念品）

沉浸于阅读上述名著，去动手动脑而只动脑筋，慢慢地仔细地思考问题，不忙做出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干脆用自己的‘客观立场’去‘深入观察研究’大字报和辩论会”，“我完全沉溺于这些活动中，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我有生以来思想特别活跃的‘日日夜夜’，在思考问题的思想矛盾中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我的思想活动基本上是陷于极度紧张、混乱，往往循环往复，有时已想清楚的问题，却突然又搞不通，而未解决的问题，却有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总之一是矛盾百出，至今是否已最后彻底解决呢？我实在不敢说是已解决了，因最近一个礼拜的思想又有些混乱，整理不出头绪。”正是这种思想状态促使我“在任何（辩论或批判）会上连一次掌也没鼓过，只是在一旁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双方的争论”；“由于思想上仍搞不通，所以我不愿在北大（关于积极投入到反右派斗争）致全

理”，这样“满可以不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六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国大学生的信上签字，因我仍不理解和没法接受这封信的内容。”

我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上充满矛盾和纠结的状态下，抱着向党交心的意愿，将这份陈述自己对反右派斗争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和看法的汇报材料交给当时的班党支部书记石世奇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材料显然是一份典型的可供批判的反面材料，按规定是要存档备案的，可能会有对我极为不利的后续处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石世奇同志看了以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上交给上级领导，而是悄然还给我，并特别嘱咐我自己保存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身边保存至今的这份文字材料已成了我如烟往事中一段特殊成长旅程和心路历程的历史记录，一件石世奇同志和我之间隐秘关系的历史物证。

多年以后在56级老同学一次聚会上，同窗好友听了我的这一段往事的讲述，都感到意外地惊奇。此前他们对此事毫无知晓，想不到当年我对反右派运动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藏有连身边同窗都觉察不到的大“秘密”。他们说我是值得十分庆幸的，当时没有被波涛汹涌的反右浪潮吞没掉，算是“逃过一劫”；有的说这桩“过去从未言及的往事”，可谓是“颇具特色的传奇”故事，是令



1961年56级经济系学生毕业合影

前排右四党总支书龚理嘉，右六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右七系主任陈岱孙，右八周炳麟教授，右十罗志如教授，右十一樊弘教授，后排右五赖荣源（中国新闻社摄）

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有的还指出石世奇同志那样做并非偶然，那时他也保护了同窗中许多其他涉世不深的小字辈（中学毕业生，不同于年纪较大而阅历较深的调干生）。回忆这段经历，当年在特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石世奇同志作为党支部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心胸坦荡，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尽力保护了班上那些曾发表过激言论的同学尤其是呵护那些天真无邪、心灵稚嫩的一群平时他戏称为“金童玉女”的小字辈，使他们得以“过关”，免于被划定为右派的命运。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上述传奇式举动，使我这一未谙世事的归侨学子得以“幸免于难”。他对我问题材料非同寻常的处理办法，像一只无形的援手“瞒天过海”，帮助我“蒙混过关”，使我得以免遭沦为所谓“反右补课对象”的厄运，

同时也解除了此后在各项运动中头上可能要顶着“漏网右派”的无形帽子的后患。反右派运动的这番境遇，使我能够“有惊无险”地迈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能够“轻装上阵”继续走好我的人生道路，能够“与时俱进”一步一个脚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走。从此，我将石世奇同志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己，一位胜似兄长的同窗好友，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遇到问题困难，都乐于找他交谈商量，请他“解疑释惑”，而他每每都能给我悉心的关怀、帮助和鼓励。从大学本科开始直至退休以后，我一直乐于找机会跟他就我感兴趣的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时事问题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和看法，跟他倾心探讨问题，交换意见，从中我经常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思想认识上新的收获。在我的成长旅程

中，他对我确是有知遇之恩的，是我人生旅程中遇到的一位贵人。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右斗争运动后期，进行整党时，56级党支部被批评为领导右倾，斗争不力，没有落实上级要求，右派划得少，划得晚，石世奇同志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难能可贵的是，石世奇同志遭受到这种错误的不公正待遇之后，却能够表现得“忍辱负重”，淡定从容，无怨无悔，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在北大本科学习时我们不但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刻骨铭心的严峻考验，而且还要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学校组织我们走出校门，辗转于北京市郊区和周围县镇，三下农村，先后驻留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怀柔县的东流水庄大队和通县的高碑店人民公社，三个地方驻留时间长短不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研究，参加相关的宣传和筹建工作，跟农民同住，同劳动，同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其间还根据当地的实际联系情况安排开课题生学位。实际上，根据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兴趣，毕业时我填报的志愿首选是分配方案中的一个涉外研究所，但结果未能如愿，不免令人不能释

怀。多年之后有机会询问当年掌握情况的石世奇同志，这是否与当时我的归侨身份有关。他如实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当时主要是考虑我生性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也优秀，年纪又轻，有培养前途，将我保送攻读研究生学位较为合适。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上世纪50年代末，北大经济系根据中央教育部的指示，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率先在全国创建世界经济专业，经济系根据我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志趣与意愿，批准我选修世界经济专业美国经济研究方向，这样我就成了文革前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正式培养的首位也是唯一的研究生。

当年世界经济专业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专业，世界经济教研室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年轻教员，仅有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赓先生因病早已退休，唯一的资深讲师就是教研门办学的活动等。此后我们还组织两次下厂，夏天到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进行劳动锻炼，在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气氛中，参加当时的大炼钢铁运动，冬天又下该厂和工人相结合，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编撰题为《毛泽东论经济》的通俗读物。

大学本科五年学习期间，在当时提出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七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先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和走出课堂，开门办学的下乡下厂运动，使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的双重冲击和干扰。与此相呼应，在校内也掀起“红专大辩论”和“学术大批判”的“教育革命”运动，围绕“读书、运动和劳动孰重孰轻”的命题争论不休，课程安排随之反复折腾，屡屡生变，人为形成教学活动同政治运动间的对立关系，其结果热衷于所谓社会实践活动却贻误了我们的学业，有的课程内容搞得支离破碎，有的课程搞所谓“先破后立”，“批字当头”，以批判代替学习，实际上连对批判的内容都搞不清楚，有的课程因时间不够，安排不开，干脆删除。最后毕业时间被迫延后，勉强组织突击“补课”了事。我们这一代本科毕业生，领着残缺不全的学业成绩单走出校门，带着学识上“先天不足”的“硬伤”走上工作岗位，当年考入北大时怀抱的对人生美好未来的憧憬终成泡影。

1961年毕业时，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留校并直接保送至经济系攻读研究室主任洪君彦老师。按规定研究生导师必须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的，以变通的做法，严教授成了我的名义导师，实际的



1964年同研究生导师严仁赓教授讨论

指导工作则是由洪君彦老师承担。

世界经济专业的创建几乎是“白手起家”，身负重任的洪老师穿梭于校内外，既要忙于校内联系安排教学工作，又要同校外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商议协作事宜，还需带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同仁多方“充电”，广泛吸收新的知识与信息，为开讲新设课程作精心准备。在百忙中，洪老师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主要是布置阅读参考书和其他相关文件资料，这同经济系享有盛誉的“特菜”专业——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那种“手把手”带徒弟的指导方式相较而言，显现粗放一些，有的同窗戏称之为“放牧式”。不过，研究生头一两年的学习任务，主要是研读基础理论著作，诸如《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等。这些课程均由北大资深教师主讲指导，精心的教学使我们受益匪浅，打

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治学功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研读《资本论》课程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意识地配合主讲老师的讲课进程和内容作了系统的配套安排：课前下功夫做好预习，以期能预先带着疑难问题去听讲，课堂上有的放矢地用心听讲，以求得出答疑解惑的教学效果，课后则抓紧时间整理好听课笔记，温而复习之，巩固既得的知识，并据此作了原著相关精华部分和精辟论断的翔实摘要，作为学习成果，供后续相关作业需要备用。作为主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资本论》课程的考试成了研究生“资格考试”的重头戏，当天考试并未设时限，考完为止，考场也不设监考人，靠自觉守纪。考试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延续到傍晚七八点钟才陆续考完，中间允许考生请同学帮忙到

食堂打饭，让我们在考场进餐补充营养，真可谓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大考。1966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从一位同事王老师处了解到，该课程资深主讲李志远老师对我扎实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曾特别表示肯定和赞许。在攻读研究生时期这种潜心研读经典的机会是难得的，但也是短暂即逝的。

1962-1963年全国又开始陆续展开一幕幕的阶级斗争，先是“农村四清”运动，接踵而来的是城乡乃至北大校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冬我们就近到通县的马驹桥镇搞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冬至1965夏远赴湖北荆州参加当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在湖北农村下稻田劳作时可能疏于对吸血虫的防护措施，回学校后我发高烧。住进校医院一个多月，高烧不退，病因也未能查明，不得已转院至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救治，一扎耳血当场就确诊为血吸虫病，马上安排住院治疗。血吸虫病属我国南方农村的一种流行病，在北方不会发生这种病症。实际上当时我不但是北大校医院曾收治而未能确诊的唯一血吸虫病患，据悉也是北医三院历史上收治的第一例血吸虫病，为此院方对治疗方案特别重视，安排内科主任坐镇，主任医师主治，对实施的每一个注

射锑剂的疗程，均随时进行密切观察，严阵以待可能发生的意外。幸运的是，整个疗程有惊无险，完满成功，没有留下后遗症，唯一的遗憾是因病贻误了我参加1965年北京大学全校应届研究生毕业照的宝贵机会，同时接有关规定，我因有传染病史而失去了义务献血的资格。

发生在我身上的大病是得以顺利解救了，不幸的是我们逃避不了社会大环境连续不断出现大变动的负面效应。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冲击下，我们直至1965夏才安排离开湖北回到学校，此时已是临近毕业的时间，按原来时间安排我们无法完成学位论文，北大的研究生专业培养计划陷于虎头蛇尾的窘境。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教育部将南翔部长宣布了较为明智的硬性规定：不交毕业论文就不准毕业，这样也算是给予先天不足的学业某种后天弥补。我的学业属四年学制的涉外专业，按规定需要延长半年，用于赶写毕业论文。1966年初交上毕业论文，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也算是有始有终，对学位终有一个正式交代。此前在北大我已先后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我在攻读研究生学位阶段政治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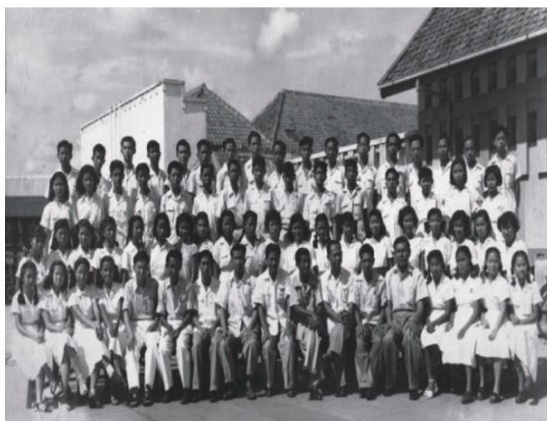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十年动乱

我作为世界经济专业的首位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以补充教师队伍。不幸的是，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我到任不久，在教学岗位上还未及起步，便迎来北大以聂元梓为首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顷刻之间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北京大学这座顶着强加的“池深王八多”的骂名的最高学府，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遭受到空前浩劫。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北大校内和校外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一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运动前期，北大校内率先于全国出现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局面，一派是当时处于“执政”主导地位的拥护聂元梓的当权派（简称聂派），另一派是因与聂派持有不同意见而受压抑，主要由经济系老师杨勋为代表的反对派（简称反聂派或杨派）。两派在校内尤其是在经济系对立斗争中渐次趋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种胶着状态并未维持多久，一个突发事件使情况发生逆转，杨勋的弟弟和她本人先后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这缘于江青在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东操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的全校万人辩论会（实际上是赶走原中央派到北大的工作组大会，此前江青调查北大运动伊始就通过北大广播电台宣布：“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

靠边站！”）发表的出乎一切人意外的一番讲话。在会场上她突然上台声嘶力竭地对着上万名师生说：“阶级斗争斗到我家来了！”“张韶华（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妈妈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她把大女儿嫁给了毛岸英，又把二女儿（张韶华）趁着毛岸青发病嫁给岸青。毛岸青根本不需要她们照顾。”“我们根本不承认张韶华是我们的儿媳妇。”然后又大声说：“李讷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四清，是你们北大的郝斌和万云一起迫害她。”江青一边说一边哭，还说她身体不好，得了一种什么病，很痛苦，头发都掉光了。全场的人被她的这番反常的讲话惊得目瞪口呆。杨勋当时觉得在这场合她这样讲话不成体统，水平太低，影响不好”，我自也心里想到一位政治家将家事隐私随便抖到严肃的群众大会上，不免让人想起街上泼妇的形象，的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举动。江青当场还表示：“毛主席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况，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主席很想见同志们。”过后，杨勋根据这一句话同也关心北大运动的弟弟一起找中央文革反映北大的运动情况。江青亲自接见杨勋姐弟俩，他们表示想见毛主席，但此愿望未果，迫不得已最后让江青将他们事先准备的由杨勋姐弟俩署名的一封短信转交给毛主席。正是这一封信闯了一个



巴中53级初中学生毕业合影
(前排左五黄天美老师、左六梁英明老师、左七曹辉贤老师、第三排右六赖荣源)

大祸。信上几行字的内容，主要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后来杨勋姐弟俩因反对聂元梓，特别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先后被聂派红卫兵扭送监狱，以反革命罪受到几年监禁。

在聂派施加的高压下，我们杨派受到批判，纷纷被迫作检查。对运动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压而不服的，没有过几个月，1967年春随着北京市高校运动中出现以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两大派的对立局面，北大校内也相应地形成对立的两大派，一是由原聂派转化的“新北大公社”（简称“公社”）和由原杨派转化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兵团”），两派分别对应于“天派”和“地派”又重新燃起“战火”，由文斗渐次转化为严重

武斗。在“执政”的聂派公社高压下，参加兵团的许多老师不得已被迫参加所谓的“下山学习班”脱离组织，我们年轻教员对那个“学习班”不屑一顾，坚决不“下山”。后来我们的宿舍被公社占领，不得已离校另找栖身之地，过着逍遥派的生活，直至中央派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北大，才回到学校。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与备战相关人员的疏散工作，1969年10月在8341部队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北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到江西省鄱阳湖边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后改称北大江西分校）。农场创业初期，生活条件差，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多处漏雨的大稻草棚，里面用木板搭成两层大通铺，中间拉上草帘将男女分开；用餐无副食，常吃酱油拌饭，做饭还需动员大家到荒地割野草当柴火用；用水也成问题，打井出来的水表面

飘着黄色油层，散发出铁锈味，洗澡后常引起皮肤过敏，使用前需撒明矾净化。后来几经努力，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住房方面，继建有中间打了几个隔断的成排稻草屋之后，又建成几排砖房，可以分别满足家属和集体宿舍的需要。除了自行种菜和养牛、猪、鸡、鸭等外，还可以从外面买一些东西作补充，使伙食逐步得到改善。劳动条件方面也有些改善，自力兴建排灌站后，堤内遇涝可排出堤外，天旱可从堤外引水灌溉，可以旱涝保收；购置一些农用机械如拖拉机、运输卡车、打谷机及排灌设备等，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南方酷暑天夏收夏种“双抢大会战”期间也采取适当的防暑降温的劳保措施，使艰巨任务得以安全顺利地顺利完成。

正当分校农场经过两年的建设初具规模，走上发展轨道之际，一件严重的问题使整个事情发生根本逆转，那就是血吸虫病问题。计划办干校选址时，由于当地相关人员瞒报实情，先遣人员实地调查时工作疏忽，对当地的血吸虫病疫区情况毫不知情。在农场建设过程中问题暴露出来，发生了感染血吸虫病情，虽经采取防护措施，也不能防止病情的蔓延，且患者也出现严重的病症，威胁着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分校领导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向上级直至最高领导毛主席汇报与请示。据悉毛主席为此亲自派专人实地调查，经调查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九)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确定当地血吸虫病的严重问题后，又亲自下令安排北大在江西的农场撤回北京。源于工作规划的重大疏漏导致北大江西农场撤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回北京以后我分别参加了1973年度和1974年度北大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1973年具体负责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江平原等地的招生工作。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几件事情需要我慎重处理。

第一件是关于一位女知青报考北大的问题。我们北京高校联合招生小组有一位代表某重点学校的军人招生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一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女知青。不过经我多方调查，了解到下面有许多群众反映她与部队领导有暧昧男女关系，反对意见很大。而这又发生在严打兵团个别领导性侵犯迫害女知青事件之后的敏感时期，需慎重处之。我如实地向北大驻哈尔滨招生办的领导汇报相关情况，经商议决定，北大不能录取该生，后来据悉该生是由上述高校录取的。

第二件发生在伊春地区，我弟弟当时在该地工作，他告诉我，当地群众中早已盛传地区第一把手的女儿被推荐考北大，北大在该地区唯一的招生名额中文系汉语专业是非她莫属，而且她在北大某系有个亲戚，北大录取该生后可以帮助转至该系。就此传言我下去作调研，确认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也跟该生进行面谈，借此了解到她的文化程

度属初中生水平而汉语专业对考生文化程度的特殊要求却是必须具备高中文化水平。同时我从推荐考北大的招生名单中发现有一女考生具备高中的文化程度，且该女考生是工人家庭出身，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根据上述情况我初步决定录取该女考生。不过来自省会的一位高校的招生小组领导劝我可考虑以变通方式录取首长女儿，以免“节外生枝”。他们提出上述意见并不奇怪，与我们来自京城的外来招生人员不同，他们地方招生人员可能有其自身处境的考虑，而我们则可以完全按原则办事。于是我通过一位客家老乡掌握的有关机构的直通专线电话直接跟北大驻哈招生办领导通话，他同意我提出的招生方案，录取那一位女高中生。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轰动一时的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得以免受那场鼓吹政治挂帅，大批“考分挂帅”的高考政治风波的冲击，回想起来有一点“后怕”。

我参加的1974年度高校招生工作，地点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招生办公室。该室由该委的相关人员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家各派一人组成，我便是北大的代表。在此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我有机会亲身见证和体验机关工作的操作方式、运转机制、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诸方面的差别。我感觉自己可能较适合于从事教师工



印尼巴中初中毕业证书

作。

上世纪70年代我随学校迁回北京以后，耳闻目睹我的很多亲戚朋友纷纷移居境外或正在办理相关出境手续。面对这场出境潮，刚从远离京城的五七干校回迁的我显得“孤陋寡闻”，感到迷惑不解。

后来一位从外地来京办出境手续的堂弟告知我当前有关归侨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时他想同我在东北林区工作的大弟弟联系，问他是否愿意跟他同行。不过堂弟似乎没有收到我大弟弟的回音而自己自行出境。

当时我了解到我们分散于全国南北方的七个兄弟姐妹均尚无出境意愿，工作生活诸方面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基本是有保证的，且我跟父亲提过，他只需全力照顾好国外家里留下的四个小弟弟妹妹即可，无需再多费心于国内的子女。实际上，父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坚持给我们以一定的经济资助，可能意在让我们安心留在国内。据悉父亲还跟我妹妹提过香港

并非一个好去处。后来我的一位妹妹随丈夫移居香港，不过行前我妹妹的舅舅曾当面对我说，他将安排外甥到自己公司工作，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然而，对我而言，是否出境，涉及的并非纯粹生活出路问题，而是涉及我的信仰，对祖国发展前途的信心，是否坚持当年自己回国的初衷（初心）和牢记自己的理想（使命）等重大问题。回顾这一段经历，我想自己对上述人生道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明智抉择，成就了自己的无怨无悔的人生。

回望十年动乱，政治运动中几经反复折腾，我深切痛感所谓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使我们失去了成才立业的美好机会。岁月不居，那时我在北大经济系先后已度过十年寒窗和十年动乱的漫长岁月，不知不觉已步入不惑之年，而事业上却还处于“壮志未酬”的窘况，不免令人感受到青春年华几近虚度的悲情。

教书匠心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北大燕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百废待兴”，世界经济专业为适应新的形势，重整旗鼓对教学计划和课程作了重大调整和改革，打破了偏重于国别经济课程的局限，设置和充实新的专业课程。

根据分工，我准备承担“资本主义货币与银行”课程的教学任务，为此，我按时到具有教授部门经济课程优势的中国人民大学听课进修，多方收集和钻研相关书籍与资料，下功夫积极备课。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考虑强化英语学习。我上大学本科时，俄语是外语课的唯一选择，且仅限两年的俄语基础课，欠缺实际应用的机会和能力；研究生学习阶段，根据专业需要，自己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努力自学英语，刚打下一些基础，却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半途而废。我痛感英语水平低是我们从事涉外专业工作者的“软肋”，是熟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拦路虎”。

回想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感触颇深。改革开放初期，我的专业学识业已荒废多年，1979年我上第一堂美国经济课，题目引人注目，引来了众多旁听者，其中还有一些外系的青年老师，但是第一节讲完了后，听课者一下走了一半，给下马威，弄得我在第二节课深感失落，这堂课算是搞砸了。

痛定思痛。究其原